

盧兄之死*

◎ 謝燕清

* 本研究受到南京大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預研項目資助。

福柯（Foucault）對身體和權力的解析揭示了資本主義興起的同時，近代國家怎樣基於韋伯意義上的理性，通過規訓身體建立權力系統¹。秉承這個思路，有學者開始探究近代中國身體規訓的歷史脈絡。由於中國近代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國人把注意力開始轉移到身體和國民性問題上，以致於「軍國民」、「新民」、「新文化」、「公民運動」密集地出現在中國²。國共兩黨在1949年以前的競爭在身體規訓領域同樣如火如荼，但實施的都是不同理念的現代性方案，因為兩黨的思想源頭都來自歐洲³。因此兩黨的政黨倫理和關於民族國家的建構方案有著某種同構性和家族相似性⁴，這也是兩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達成妥協與合作的基礎。

經歷了南方蘇區和延安兩個時期，共產黨終於通過延安整風和土地改革，找到了鍛造新人的途徑，即利用現代的政黨倫理和階級鬥爭技術配置起來的道德政治。在新德治中，人的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被分離開來，階級鬥爭成為政治身體的靈魂所在⁵。革命隊伍的整合模式經歷了肅反模式—懲罰主義模式—搶救運動三個階段，體現了黨內磨合技術的成熟，而這需要擁有成熟的政黨倫理，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標誌著共產黨的成年禮⁶。訴苦技術的發明，則顯示了共產黨高超的治理藝術和潛質⁷。無論是搶救運動還是訴苦技術，都使得被動員方與動員方協調起來，投入到運動中去，展現了共產黨在社會動員中調動情感的能力⁸。經過幾次大的軍事戰略失誤之後，軍閥倒戈、中間黨派北上、地方人心潰散，國民黨這個泥足巨人連劃江而治都不可求，暴露其在身體治理方面與共產黨的巨大落差。

繼承了清末以來身體治理運動的歷史使命，共產黨展開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其中之一就是重新調整中國的階級關係和秩序。區別於針對農民的身體治理技術—「訴苦」，黨摸索出針對知識份子特點的「洗腦」技術。本文將通過對《青春之歌》的敘事分析，揭示在文藝形式下，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共產黨整合知識份子的身體政治技術的某些技巧。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⁹的社會污染與塗爾幹（Emile Durkheim）¹⁰的社會失範是分別針對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提出的概念，顯示了社會是如何確立其秩序的，以及面臨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時的應對辦法。《青春之歌》在處理盧嘉川和江華的命運時，顯然不僅考慮了其對文本內部秩序的影響，更受到文本外部的社會秩序對文本解讀的指導性壓力。處理盧嘉川的命運，就是作者執行社會清除威脅的結果，作者不是文本的上帝，如塗爾幹所言，社會才是上帝。

同樣是革命者，為甚麼盧嘉川不能見容於革命隊伍，扯活下去繼續革命工作乃至和林道靜建立革命伴侶關係呢？現在我們就來探究一下究竟盧兄做了甚麼越軌的事情，以及他身上具有甚麼樣的污染特質。作為知識份子改造的教學參考，《青春之歌》顯然試圖通過盧兄的死亡進一步向觀眾暗示更多的資訊。

一 為甚麼死的是鍾愛之人？

小說《青春之歌》的核心是拯救林道靜瀕臨墮落的肉體和靈魂為線索，就在盧嘉川引導林道靜即將成功脫離小家庭之際，卻身陷囹圄成為烈士。看似避免才子佳人的俗套，其實另有苦衷。從創作原意上講，盧是作者心目中的革命知識份子完人，理想的革命伴侶。在後續文本《英華之歌》裏，盧嘉川復活，貶低江華，重燃對盧的情愫，就是對《青春之歌》裏盧嘉川之死的顛覆¹¹。究竟是甚麼促使盧嘉川在五十年代的創作語境裏必須成為烈士呢？盧是拯救林道靜的關鍵人物，他和林道靜的對手戲直接關係到能不能說服教育人民群眾，因此他的死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小說的主創動機是敘述知識份子如何向黨靠近，但成了這本書出版坎坷的重要原因，而同時期的《紅岩》、《紅旗譜》、《紅日》卻以工農兵題材而暢通無阻¹²。「五四」運動中挾帶起的追求個性解放、打破家庭束縛、婚姻約束的風潮在新青年中成一時風氣，脫離了當時中國民眾的風俗習慣¹³，而延安文藝路線¹⁴則巧妙地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即以強大的民俗價值觀來消解五四追求個性解放的新生活價值觀，自此工農兵成了文藝批評的一個話語資源。

革命男女青年之間事實上存在動盪的情感生活，在解放後現實主義文學的敘述空間裏受到質疑。這種情感生活曾經被視為革命激情的原動力，而在解放後革命動力就只能是階級意識而非力比多。在當時反映知識份子題材小說鳳毛麟角的情況下，追捧《青春之歌》多少是有一定閱讀能力的人。而識字不多的工農大眾即使讀了，在當時的氛圍下也很難產生共鳴感。北京電子管廠的郭開作為工農讀者的代言人，列舉工人不滿的原因不過是林道靜和好幾個男人談戀愛。普通群眾的政治嗅覺沒有那麼敏銳，真正讓勞動人民反感的不是階級鬥爭領導權問題，而是林道靜等人的婚姻家庭觀。

小說初版中林道靜和五個男人之間發生過情感糾葛，和余永澤是同居（事實夫妻）關係，和盧嘉川是曖昧的暗戀關係，和江華是同居關係，和趙毓青關係密切，被徐甯單戀。其中林和余、盧，和盧、江、趙、徐之間先後又同時處於情感糾葛的漩渦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角、四角戀的關係裏。在男性中心主義視角裏，她是近乎白莉萍式的交際花，男人們習慣於追逐女性、收入後宮的模式，但無法接受女性周旋於男性之間，把擇偶主動權掌握在女人手中的換位元視角¹⁵。這可能就是「工農幹部和老工人都看不下去」的原因。楊沫按照工農階級的意見大力刪除了林道靜的情感活動，增加了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內容¹⁶。電影的介入意味著敘事脫離了小說作者個人的控制，敘事在更廣泛的社會壓力下進行，結果電影的淨化比小說更加徹底，導演崔嵬¹⁷表示要刪除林道靜夫妻關係以外一切不健康的情緒。在電影裏，趙、徐已經成為林的擦肩路人，江華沒有乘虛而入，而是嚴格止於革命同志關係，至於盧嘉川則在最大限度上回避和林道靜的情感接觸。

淨化的敘事框架會改變盧嘉川的命運麼？樹立一個烈士作為教育林道靜的榜樣固然必要，但

為甚麼必然選中盧嘉川？革命者那麼多，大家都在冒著同樣的風險，甚至江華的風險比盧嘉川更大，但江華活下來了，這又是為甚麼？

二 危險的佈道者

電影版的盧一林關係是最乾淨的敘事版本，從頭至尾二人的對白都圍繞著革命的話題展開。導演試圖把盧嘉川從曖昧的第三者角色裏摘出去，從而保持純潔的革命佈道者形象。然而不論盧嘉川的動機如何，他的行動客觀上介入了一個家庭（雖然在世俗的觀念裏，余一林不是明媒正娶），其後果造成了一個家庭的破裂。因此如何使得他的行動在道義上贏得民眾的認同，這是電影改編成敗的關鍵。作為革命者，其行為和品德不能有瑕疵，否則將玷污革命，誤導群眾。

延安文藝路線的重大調整體現在民俗價值觀念上，知識份子要向工農兵的價值趣味讓步，折射出現代個人主義向傳統倫理道德觀的讓步¹⁸。共產黨對傳統倫理道德觀以階級的觀點作了切割，保留了勞動人民的健康觀點，拋棄了腐朽的封建剝削階級觀點，然而甚麼是勞動人民的觀點，其詮釋權力掌握在黨的手裏。大眾趣味成了黨改造知識份子的一個話語策略。

雖然糅合了一點自由戀愛，余永澤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熱炕頭」、「教授太太」等等，即以家庭為本位，傳宗接代而已。家庭是男人最後的堡壘，養家糊口和保衛家庭的完整性這個責任是一體的。當余一林結合後，呈現在電影畫面上的是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場景，這是符合大眾趣味的才子佳人大團圓的局面。

從世俗觀點看，夫妻之間磕絆乃是人之常情，而且一旦余永澤工作落實也許婚姻危機就化解了。對一個苦悶的小資產階級家庭婦女而言，盧嘉川的介入無疑是生活中的一種刺激。雖然電影敘事裏用極為潔淨的手法來描繪盧林的關係，但我們仍然發現盧對林散發出不可遏制的男性魅力。比如在小學挺身退散兵、火車站領導學生南下、北大集會演講都展現了儒家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而余永澤的形象則日趨猥瑣。客觀上說，盧嘉川的革命風采（性吸引力）、革命理論促成了林一余的進一步離心離德，強化了夫妻之間的隔閡。而盧一林之間發生了甚麼呢？電影裏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畫面一年夜聚會，盧一林促膝談心，稍有民俗常識的人都知道，畫面中紅燭台和紅酒、小窗下，郎才女貌一對佳人，夜深人靜相對而坐，更像是洞房花燭夜互訴衷情。然而導演立即用對白引開觀眾的歪念，可是談話內容依然是用革命大道理引導林遠離余永澤的小家庭¹⁹。

終於，余永澤這個最受傷的男人憤怒了，他一面警告盧嘉川不要破壞他的家庭，一面對林道靜喊出「你是我的」。那麼余永澤作為林道靜丈夫的權利何在？在小說設定的年代裏，中國社會還是一個父系的從夫居制社會，就余永澤個案稍有變化，增添了自由戀愛和小家庭模式等因素，但沒有改變傳統的父系繼嗣制度。余一林的結合雖沒有正式的婚嫁儀式，但婚後生活來源都是余永澤的地主父親資助，自由婚姻建立在「啃老」模式上，林道靜的生活完全依附於余氏家族。丈夫和妻子的權力與義務關係平衡主要看丈夫供養妻子的能力上，沒有財產基礎，婦女的地位是十分脆弱的²⁰。民眾會自發地同情正當權益受損害的丈夫，而厭惡不恪守婦道的妻子，以及插足他人家庭的男子。在沒有覺悟的保衛小家庭的群眾心目裏，革命者佈道者和游方僧人是同樣危險的，如《水滸》裏勾引楊雄老婆潘巧雲的和尚裴如海。

電影敘事採取三種策略扭轉盧嘉川的曖昧色彩，一是樹立盧嘉川清教徒的形象；二是醜化余

永澤，除了把余從一個英雄救美的書生矮化為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個人主義者，還通過余永澤逼走盧嘉川一幕暗示餘對盧的死有間接責任；最後是在余—林關係上做文章，導演崔嵬通過魏三大伯借錢揭露余永澤的階級立場，暗示林—餘感情的破裂實質是階級決裂，從而進一步為盧嘉川「破壞」林—餘婚姻尋找合法性²¹。

當盧嘉川基本完成了引導林道靜跳出個人主義小家庭的任務之後，他的存在無論在小說或電影裏都變得非常尷尬。他繼續活著，顯然和林道靜情感將公開化，玷污純潔的革命動機。在小說初版裏，盧的動機的確並不單純。犧牲掉盧嘉川，把他推向共產主義完人，可以徹底杜絕觀眾心裏不健康的聯想，這是《青春之歌》敘事承受的壓力。在五十年代的革命話語背景下，革命布教活動符合革命倫理價值導向，然而父系從夫居的家庭倫理觀念也頑強地以勞動人民的倫理價值名義獲得存在的合法性。在兩個合法的倫理價值之間，盧嘉川「生不如死」。

革命倫理以對傳統倫理的部分讓步，來換取大眾對革命倫理的支持，從而在社會上形成孤立知識份子的氛圍，這是1949年後中國知識份子社會聲望空前跌落後，失去歷史上擁有的自尊和自信後而迅速投入到自我改造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知識份子在倫理層面上不再是道德的典範和維護者，相反還成了罪人。盧嘉川在道德上的曖昧反映了知識份子的困惑，他的死也和這種倫理失範有著深刻的關聯。

三 肉身之罪

按理說，洗刷乾淨了的盧嘉川沒有了性的欲望，可以給他一個生的機會和離開余永澤的林道靜交往，以證明兩人的清白。文本中還有一個烈士備用人選，那就是江華，他的事蹟也足以教育林道靜繼續前進。可是小說和電影都沒有朝這個方向改編，這就意味著盧嘉川之死還有著更深層的原因。

我們先看看和林道靜關係最密切的三個男人的基本狀況：

	余永澤	盧嘉川	江華
身份類型	北大學子		
	中間知識份子	革命知識份子	
氣質	書生		亦工、亦農
性	性欲明確	性欲曖昧（被去性化）	無欲
結局	迷失（改造物件）	烈士	革命領導者

我們看到，前後共同分享林道靜情感生活的三個男人表面上看有一個共性，即北京大學的學生，即知識份子。按照黨的類型學劃分，余屬於中間類別的知識份子，盧、江則屬於革命知識份子²²。余永澤的死活不是小說的重點，倒是盧、江兩個人的命運耐人尋味，從工作的危險性而言，江的風險顯然高於盧，但江卻屢屢化險為夷，這必須到兩個人的差異中去尋找原因了。

同為革命類型的知識份子，盧、江是有明顯區別的，而這正是問題所在。電影裏人物造型氣質差異鮮明，盧接近余永澤，而江華更像是穿了長衫的敵後武工隊員。在小說文本裏，兩個

人背景各有交待。江華認為自己「不算是大學生。說是個工人，還更合適。」他出生於上海工人家庭，幹過學徒工，工讀期間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育，參加工人運動，以後托人買了假文憑考入北大哲學系²³。盧嘉川則代表純知識份子型的革命知識份子²⁴。

江華執著地堅持工人階級身份，僅僅是出於素樸的階級情感麼？在五十年代，知識份子/大學生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他們的階級本性卻是同社會主義根本相反的。……遇到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要他們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的、國家的利益，他們就覺得社會主義是不可忍受的東西了」²⁵。知識份子幾乎被擠壓到叛亂者的邊緣，基於這樣的判斷，江華怎麼可以放棄工人階級護身符呢？

解放前夕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有一定矛盾張力，一方面需要統戰，另一方面又懷疑知識份子對革命的忠誠度。毛澤東指出，在知識份子沒有和民眾革命鬥爭打成一片時，其思想是空虛的，行動是動搖的，在關鍵時刻就會出逃兵乃至叛徒，並以陳獨秀和張國燾為例²⁶。根據這個提示，小說再版本裏增寫了戴愉叛變的過程。毛還提出了知識份子無知論、工農有知論，用生產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理論來消解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優勢²⁷。正是基於這樣的環境，江華放棄了知識份子立場，逼著林道靜承認自己在工人階級面前是繡花枕頭。那麼江華自己又是甚麼呢？

基於對舊知識份子疑慮，取而代之的戰略應運而生。早在1948年，任弼時就指出要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如果只能利用舊的，而不著重去培養工農知識份子，那就會要犯錯誤」²⁸。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大鳴大放運動本來是想改善和知識份子的關係，結果發現知識份子的確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便提出了紅專理論，重提建設工人階級知識份子隊伍的標準。江華的身份和氣質便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鍛造成形，他在學識上夠得上專，小說文本裏指出他考上了北大哲學系；同時也夠紅，在黨的呵護下成長於工人運動；還具有藐視白專路線的舉動，如買假文憑獲得考試資格，以及不承認大學生身份的革命姿態。當然，他的專還體現在他本人豐富的革命鬥爭閱歷上，這很符合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知識、生產鬥爭知識與專業知識兩分法，達到了五、六十年代紅專理論下的黨員知識份子標準。

江華的歷史定位已然明確，他就獲得了不死之身。在電影銀幕上，我們看到江華的農民和工人的扮相，絲毫不能引起人們的詫異，可見他的身體與這兩個身份是多麼的吻合。不僅特務抓不住他，而且他的身體也百煉成鋼，他在農村鬥爭中雖然流血還能有旺盛的鬥爭精力。小說裏還有進一步的描繪，說他雖然流著血，卻仿佛沒有任何痛苦。被釘子釘在腰上後，又奇跡般地在一二九大遊行上發表演講²⁹。這一切都在向觀眾炫耀，一旦知識份子擁有了工農階級的體魄，他就擁有了不死之身。暗示著黨的知識份子改造路徑，是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在思想、氣質、體質等全方面放棄原有的獨特屬性，從而徹底融入工農大眾。

江華具有了變形金剛的體質，這就意味著盧嘉川在革命隊伍裏生態區位的喪失。盧嘉川保留了書生氣質，這暗示著他還殘留著小資產階級習氣，處於一種過渡狀態，或不穩定的狀態。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向江華過渡，徹底洗刷掉小資產階級習氣，另一種是退回去向余永澤靠近。盧嘉川停滯在中間狀態，這意味著他作為知識份子尚未改造完全的類型。他即使活下去也難逃一劫，這在續集《英華之歌》裏得到了證實，江華因為根紅苗正理所當然成為整人的一方，而羅大方等人則由於出身和氣質問題遭到了清洗。從對李大釗、蔡和森等純知識份子型革命先烈的解讀中，尤其是作者明確把盧嘉川這個人物形象與李大釗一起赴

難的方姓大學生聯繫在一起³⁰，這就明確暗示了盧的悲劇性命運是和黨內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歷史命運相關聯的。男女關係在革命隊伍中從來都不是致命性的因素，失去了在黨內的歷史定位，盧嘉川的身體就喪失了逃脫特務追捕的機敏性和在牢獄裏的抗擊打性能，他所唯一能作的貢獻就是以死來證明自己的忠誠，作為回報，黨和人民把他奉為烈士而不朽。

要麼成為江華那樣的紅專知識份子，要麼被歷史終結，這大概是大部分觀眾看完電影後的觀感。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幾點意見》，提出要發展知識份子入黨。不過直到中共十二大才修改了黨章，為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徹底正名。黨宣佈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知識份子身上的污染特質（小資產階級）被取消了，對知識份子的身體規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要素淡化，其結果是1979至1989年，全國共有275萬知識份子入黨³¹。

註釋

- 1 福柯(Michel Foucault)，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99）。
- 2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3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2005）。
- 4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172。
- 5 應星：〈身體政治與現代性問題〉，載楊念群等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689—705。
- 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7 郭於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仲介機制〉，載楊念群等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505—526。
- 8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
- 9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ARK, 1984).
- 10 塗爾幹(Emile Durkheim)：《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書店，2000）。
- 11 孫先科：〈《青春之歌》的版本、續集與江華形象的再評價〉，《河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頁71—77。
- 12 錢振文：〈「難產」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壇》2005年第5期，頁49—55。
- 13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生育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1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張清華：〈從「青春之歌」到「長恨歌」〉，《當代批評家評論》2003年第2期，頁75—91。張清華的分析揭示了林道靜在擇偶問題上騎驢找馬的主動意識。事實上也是作者楊沫人生經歷的折射。

- 16 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264。
- 17 崔崑：〈《青春之歌》創作中的幾點體會〉，載《《青春之歌》從小說到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頁254。
- 18 劉鐵樑：《解放區民間文藝概說》，載《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學術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43-150。
- 19 戴錦華：〈《青春之歌》：歷史視閥中的重讀〉，載《鏡與世俗神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75。
- 20 寶森 (Laurel Bossen)：《中國婦女與農村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21 崔崑：〈《青春之歌》創作中的幾點體會〉，頁257。
- 22 黃鑄：《中國知識份子的道路》（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8），頁11。
- 23 楊沫：《青春之歌》（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2），頁252，258。
- 24 傅希春、馬瑩伯：〈讀《青春之歌》〉，載作家編輯部編《〈青春之歌〉評介》（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頁32。
- 25 黃鑄：《中國知識份子的道路》，頁16。
- 26 毛澤東：〈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摘自《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論知識份子》（教育出版社，1949），頁1-2。
- 27 毛澤東：〈革命知識份子的改造〉（摘自《改造學習》），頁6。
- 28 任弼時：〈知識份子問題〉（摘自《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載解放社編《知識份子與教育問題》（北京：新華書店，1949），頁14。
- 29 楊沫：《青春之歌》，頁590，610。
- 30 楊沫，〈我為甚麼寫《青春之歌》？〉，載作家編輯部編《〈青春之歌〉評介》，（北京：作家出版社年版，1959）。
- 31 楊鳳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理論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231-232。

謝燕清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人類學所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期 2008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